
关于上海四个日军慰安所的调查

苏智良 编

上海曾是二战时期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完善的城市之一。近6年来,我们对这些慰安所进行了系统调查,现在可以认定的日军在沪慰安所至少有80家。这里辑录的沈小枫、邹淑慧、姚潇鹤、张虹、李漪红、苏律健、张敏霞等人的4份调查,反映了上海日军慰安所的几个类型。“杨家宅娱乐所”是战时日军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军队管理的慰安所,从1938年1月开业到1945年8月关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庆宁寺慰安所和旗昌栈慰安所设立于浦东,它们表明,上海日军慰安所的地域广阔,而且这两处都是日侨设立的慰安所。南翔金家园慰安所则是日军强令汉奸设立的,性奴隶都是中国苦难的年轻女子。我们将此次调查结果公布出来,一是想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史料,二是也想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到这种调查中来,以使慰安妇研究得以深入。

“杨家宅娱乐所”的调查

“杨家宅娱乐所”是日本陆军在上海设立的军队管理的慰安所。1999年3月,笔者来到杨浦区东沈家宅,采访了史富生(1932年2月21日生)、沈美娣(1931年7月23日生)两位当年知情者,了解有关当地“杨家宅娱乐所”的情况。

‘杨家宅娱乐所’位于翔殷路与民星路之间的东沈家宅内。设立前期由日本军队管理,后期由日本私人老板承包。

据史富生说:‘杨家宅娱乐所’建于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娱乐所是木质结构的单层连体房屋,外围设有约3米高的木板围墙,底部腾空三、四厘米。据沈美娣说:屋内对称摆放六或四张榻榻米,中间留有过道;其中有一屋专门存放化妆用品,如有一缸专门存放发夹、头钗等用品,有一缸专门存放雪花膏等化妆品(其中有一口缸现存于沈氏家中)。娱乐所接客室前供有神龛,大小约一立方米,形似小庙,翘角飞檐,木质结构,神龛内供奉一烧饼般大小的银块。娱乐所内设有浴室,室内建有一个水泥浴池,另设有酒吧等。据史富生说,娱乐所建立的最初两年,慰安妇大多是朝鲜人(当时称高丽人)及少数日本人,年龄约二十三、四岁,人数较为固定。1938年底,这些慰安妇随日军迁往内地,之后掳掠来的大多是东北姑娘及少数浦东姑娘,年龄约为20岁左右(交往中据其相貌、口音、衣着而知)。

据二人回忆,慰安妇多于每周礼拜四贿赂看门的日本兵,溜出娱乐所至周围村庄活动,与村民有所交往。朝鲜慰安妇用简单日语与村民会话,故村民误认其为日本姑娘。经慰安所内一绍兴厨师透露,才知其为朝鲜姑娘。她们经常请村民洗衣、做馄饨吃,付给村民日币或储备券作回报。东北姑娘有时还偷带出发夹、雪花膏及食物等赠与当地贫苦百姓。沈美娣母亲曾问及她们,为何要做这种事,她们无奈地说:‘我们也没办法,是被日本兵骗来的、抓来的,现在又逃不出去。再说,干这种事也没脸回老家,好歹总比饿死好。’沈氏母亲时常看到慰安妇脸庞青肿。一次,沈美娣从娱乐所木围墙缝中偷看到两个日本军官用枪柄毒打一中国慰安妇。

据史富生说,慰安妇把剩菜分给劳工,故得知她们食用日本饭菜,如鱼、梭子蟹、罐头(多从日本运来)等。据沈美娣说,慰安妇均

穿日本和服(后期中国姑娘可穿中国服装),观察其解手,知其不穿裆布;着木屐;娱乐生活单调,无报纸、广播,只能自娱自乐,自唱自跳,偶尔听听留声机。

通常来说,慰安妇一周洗两次澡,由绍兴厨师用手按式水泵打水,用木柴烧水。日本士兵与慰安妇多人共同入浴。每周一为检查身体的日子,主要查有无身孕、梅毒、淋病等症状(据史富生说日军用606药膏治梅毒)。由四、五个穿白大褂的军医坐吉普车前来检查。后期慰安所的管理者为带无框眼镜的日本小老板(人称“小乌龟”)及其母(人称老鸨,约50多岁,后坐飞机回国,失事而亡)监督。据史富生亲眼目睹,慰安妇坐于高凳上,裸身叉开腿检查。

平日军官身穿呢制服、佩军刀、穿军靴,步行、骑马、骑三轮摩托车或坐吉普车由前门小道而入,每天都频繁进出。士兵则多数于周六、周日坐卡车而来,每车三四十人一起进入,士兵通常扎绑腿布,携有带刺刀的三八式步枪。还有些文职人员,身穿便服,可能是四川北路日本领事馆等处人员。有些军官用手摇式电话预约。慰安妇接客不定时,不定人数,通常下午、晚上较多。据史富生称,听马金发夫人提到:“一个人连接6人,哪能吃得消,痛也痛死了!”军官可挑选慰安妇,士兵则无权挑选。年长慰安妇接客较少,据沈美娣说,接客少或不服从者全被老板用枪柄毒打。年纪过大者有的被赶出娱乐所。

娱乐所长期雇佣一50多岁的中国绍兴男厨做长工,其余工作,如修门窗、锄草等则临时雇佣当地的村民(现大多已故)。他们以实物如大米、油、面粉等做酬劳。史富生说有一木工与一中国慰安妇发生关系,后染上梅毒而亡。由此可见,尽管有卫生检查,仍免不了有性病存在。

(沈小枫、邹淑慧)

浦东庆宁寺日军慰安所的调查

位于浦东上川路庆宁寺路渡口附近的一幢二层住宅楼房,是上海沈生记营造厂的创办者沈生杜(已故)老人的私房。抗战时,这幢房子曾先后作为日军的军指挥部和军人慰安所。

沈生杜是二、三十年代上海较为有名的民族资本家,他拥有不少产业,发家后便在浦东庆宁寺地区按当时市区流行的石库门样式修造了这幢两层楼高的住宅。由于是居家,因此它比一般的石库门更为高档,有晒台、花园。住宅的周围还建了一圈平房,这平房既租赁给他人居住,又可起保护作用。从地理位置而言,这幢房子靠近上川路这条公路主干线,离庆宁寺渡口也不远,在当时的庆宁寺地区可以说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住宅。

抗日战争时期,浦东庆宁寺地区有上川铁路可直通川沙,也有轮渡直接摆渡到今天的外滩。在淞沪抗战时,庆宁寺是中国军队一条重要补给线,也是中国军队撤退的一条必经之路。淞沪抗战后,在庆宁寺地区还活跃着几支游击队。所以,日军占领该地区后,立即安排驻军,并设立宪兵队。驻军的指挥部就设在沈生杜的家宅内。

据沈生杜之子,今年73岁高龄的沈文奎回忆:日军入侵上海那年,他已10多岁了,和母亲及哥哥住在这里。日军进攻时,他们举家收拾了一些东西就躲在金家桥的农民房子中住下来。日军的驻军指挥部在他们的家宅设立后,由于不适应中国家具,曾派一名翻译强令沈文奎的母亲搬走了所有家具。随着该地方局势渐趋平静,驻扎的日军也就撤离了该地,但这幢楼房并没有归还沈家,而是在此设立了一座军人慰安所。

对于慰安所的开办时间,居住在沈家宅周围平房的马瑞坤说,

他是八一三事变时由复兴中路先至浙江中路,9岁时搬到庆宁寺地区居住至今,现年69岁,他搬来此地时,这幢房子已经成为日军的慰安所了。由于沈家房子在作为慰安所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还作过日军指挥部,所以,我们推测慰安所的开办时间为1938年。

据两位老人回忆,慰安所的门前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标志,慰安所的规模并不大,当地人习惯上称这座日军的慰安所为“东洋房子”。沈文奎和马坤两位老人都证实这一慰安所中的慰安妇都为中国的妇女,是从外地掳掠来的。马坤说,据他所知,当时慰安所中的慰安妇只有两三人,其中有两名慰安妇经常在门口活动,穿着同当地妇女一样的旗袍。

虽然当时在靠近渡口处有美孚石油公司等外国企业,但出入慰安所的只有穿着军装的日本军人。马先生曾偶尔有几次见过日本军人出入慰安所,数量很少。因为慰安妇较少没有大批日军进入的情况,并且,据他了解,慰安所空闲的时间比接待的时间多,而且这些日军大都步行而来。当时驻扎最近的是一支日本宪兵队,驻扎在沈生杜住宅200米处的一座两层建筑中,其址在上川中学后面,日军占领上海之前为当时的上海市轮渡管理处。马先生告诉我们慰安所的老板名叫小野,当时和小野一起居住在慰安所的还有他的妻子、孩子和日本籍佣人。小野和附近中国居民接触并不多。后来小野不知什么原因去参军,马先生亲眼看见其妻出门送别的情景。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小野及其家人、佣人随日侨回国离开了庆宁寺地区,而几位中国慰安妇的行踪也无人知晓。

这座日军慰安所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据马先生估计,慰安所开办了大约2-3年。

(姚潇鹑 张虹)

浦东其昌栈慰安所的调查

1997年10月,笔者就慰安所问题走访了陈柄荣(1923年生)、黄文忠(1914年生)两位老人。他们都是其昌栈日军慰安所的见证人。解放前,黄文忠是陈柄荣家的管家。现将调查情况记录如下:

日军入侵上海期间,浦东钱仓街350号(旧名其昌栈大街)曾在此设立了一处慰安所,它是四川北路日军慰安所的分部。

据两位老人的回忆,其昌栈慰安所的房产原为陈柄荣亲戚所有,它是旧上海浦东地区最好的住所,主楼为二层式砖石建筑,前后两排房子有三、四十间之多。

1944年冬季的一天夜里,日本宪兵冲进房内,将陈柄荣等人赶至主楼后面的一排屋子,并命令他们把原屋内的家具摆设一律搬走。不久,这里便陆续住进一批年轻女子,年龄平均在20至28岁之间,穿着普通,均是中国妇女,且大多操东北口音。每间房住一名慰安妇,房内除一张木床别无它物。另外,还有一间房内摆着一张造型奇特的木床,呈人字型。每周都有一名日本医生给这批女子作检查。1945年8月日军搬走后,这些设施都留了下来。

其昌栈慰安所由两名日本侨民负责管理(一男一女),一名中国妇女从旁协助,年龄大约30岁,精通日语,充当翻译,有时,日本官兵过多时,她也被迫接客。慰安所内尚有数名工作人员,多为中国人,黄文忠老人当年就负责运送大米、油、盐、酱、醋等物品。原厨师为日本人,后改为中国人。这批工作人员与慰安妇之间,基本不接触。用餐时,慰安妇在房内,而勤杂人员则在固定地点。

其昌栈慰安所中的慰安妇人数约30至40人,各有编码。日本人将容貌较好、身体健康的妇女编成一系列号码;将条件差的妇女也编成一系列号码;无法再充当性工具的妇女同样有编码。这批已无法

再继续“使用”的慰安妇不久就会消失，然后又有一批“新面孔”出现。因此，慰安妇的人数虽然时有增减，但总数仍保持在30至40人之间。

慰安所门口没有明显标志，也没有森严的戒备，但管理相当严格，两个日本人的办公室面对着大门，对过往之人一目了然，外人根本无法混入，同样，慰安妇也难以逃出。平时，这些慰安妇在不需接待日本官兵时，也绝对不能踏出大门一步。每逢星期六下午及星期天，大批日本官兵就来到这里，有时甚至需要排队。一般士兵每人逗留的时间为20至30分钟，军官通常到固定编码处，并允许留夜。不管采取何种形式，都需要付出一定数量的钱款。他们一般身着军装，或单独，或集体前来。

这批慰安妇的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被日本人诱骗，二是由人介绍入内无法脱身。1945年以后，慰安妇的人数逐渐减少，工作人员也一一被打发。所以，当日本人撤走时，丝毫没有惊动四周。

以上是关于浦东其昌栈慰安所的大致情形。

(李漪红)

南翔金家园慰安所的调查

金家园慰安所，位于上海近郊小镇南翔。

这几幢房子原是有钱人造的小洋房，抗战爆发后这里却成了侵略者寻欢作乐的场所。据当地人说，这几幢二三层的小洋房刚刚造好，东家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就爆发了战争，很快，战火就烧到了上海。于是，镇上的大户们纷纷逃难而去，这几幢小洋楼也空置了下来。日本军队到了南翔镇后，到处追逐当地的年轻女子，对她们实施暴行。渐渐地，镇上的妇女或是藏匿起来，或逃往他处，即使留下的也都是七老八十了。但侵略军并不罢休，仍千方百计地想办

法发泄其兽欲,于是,他们看中了金家园的房子,在那里建立了慰安所。

金家园的小洋房有几幢,日军便找来两个汉奸先在平房里开设酒保店。做为日军官兵喝酒、消遣娱乐的地方,之后便在洋楼里开设了“东洋堂子”,也就是慰安所。

当地有一位86岁高龄的石老妈妈,她从小就住在金家园附近。据她回忆,金家园慰安所的慰安妇人数并不多,充当慰安妇的有一部分是原来的妓女或者舞女。当时兵荒马乱,这些靠卖笑活命的人很难找到“工作”,于是在汉奸的诱逼之下充当了慰安妇。还有些身世清白的女性则多是为生活所迫,被迫充当慰安妇。

金家园慰安所房间里,铺着榻榻米,上面躺着的都是中国的年轻女子。她们有时一天要遭受数名日本军人的蹂躏,卫生条件也很不好。日军官兵根本没把她们当人来看待,只是作为性奴隶,一种泄欲的工具,她们生活得十分悲惨。在这家慰安所里,有一点与其他的慰安所不同,就是这里的慰安妇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入,尽管有人逃走,但也有人进来。这是因为“没饭吃,只能进去呆在那里”。处于战火中的妇女,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活路,其中一些人走上了屈辱的道路,应该说,她们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只能出卖自己的肉体 and 尊严。

(苏律健 张敏霞)

(编者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